

## 一部里程碑意義的澳門學巨著： 《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述評

吳 青 朱湘娣

**[摘 要]** 《天朝異化之角》是一部澳門史學研究的巨著，也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如此大規模使用中西語言原典檔案文獻進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學術成果，它將16—19世紀時期澳門的政治、司法、軍事、城市建設、宗教、科學技術、教育、醫療衛生、語言文學、藝術、體育及社會習俗緊緊地連貫起來，以一種宏大歷史敘事的觀念、全方位圖景式的視野，系統地闡述了傳入澳門的西洋文明風貌。此著治學風格嚴謹、考據精確，提出了諸多新問題、新結論，例如對“澳門直街”和“堂區”的考證、批判了學術界流行的耶穌會在澳門設立“宗教裁判所”的說法、探討了莎士比亞傳入中國的時間等。

**[關鍵詞]** 澳門 治史風格 新問題 新史料 《天朝異化之角》 湯開建

在中國歷史的變遷中，海洋是兩千多年來歷史動力的逆轉力量。地理大發現加強了世界的整體性，海洋、海峽、海岸、海港一躍成爲最重要的人地關係要素，誰擁有了海洋，誰就擁有了世界。從海洋到海岸，再到內陸，這是新的文明在地球上擴展的順序。<sup>①</sup>澳門瀕臨南中國海和珠江口，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體現在它作爲中華帝國最南端的極小岬角，是海洋文明形成的一塊中華帝國的異質文明“飛地”。1557年澳門開埠之前，澳門被稱爲“壕鏡”或“濠鏡澳”。葡萄牙人寓居澳門後，這一極小的岬角不僅迅速發展成爲一座萬商雲集的國際貿易港，也成爲歷史上中華帝國最早與西方文明接觸的地方。

澳門地域細小，其古城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但卻是解讀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歷程不可忽視的一座城市。從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三百年中，以葡萄牙人爲首的大批西方人口不斷湧入，澳門逐漸成爲中西文化匯集之地，其在中西交往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16世紀以來，幾乎每一次中西文化的接觸與碰撞可以說都源自於澳門或者與澳門相關，澳門成爲了當時中國與西方世界聯繫與交流的橋頭堡。因此，澳門被時人美譽爲“世界型的土地和海洋”，<sup>②</sup>其無可替代

**作者簡介：**吳青，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哲學博士；朱湘娣，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廣州 510632

① 唐曉峰：《地理大發現、文明論、國家疆域》，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3頁。

② [葡]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35頁。

的特殊中心位置一直持續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可以說，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澳門不僅是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貿易的樞紐，更是東西方文明交融匯合之城。毫無疑問，在地理和主權上，澳門屬於中國，但在早期全球經濟貿易網絡和東西方文化交往的意義之中，澳門則屬於世界。對於澳門，人們多將其視為西洋文明傳播的橋樑和孔道，看到和關注的只是西洋文明如何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忽略了它在作為西學東漸的必經過道的過程中，同時也曾以“近水樓台”的方式積澱和承載更多的西洋文明。

澳門大學歷史系湯開建教授於2016年5月出版的《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以下簡稱《天朝異化之角》），是一部澳門史學研究的巨著，也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如此大規模使用中西語言原典檔案文獻進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學術成果。該著探討了西方文明在澳門的傳入、形成、傳播、發展及其影響，徵引了千餘種東西方語言文獻。在立意上，它的最大亮點是其不同於以往僅將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橋樑和溝通媒介，而着眼於東西方文化交往過程中承載和積澱在澳門的西洋文明。誠如作者所言：“人們看到的和關注的只是西洋文明如何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而忽略西洋文明不僅通過這一橋樑與孔道傳入中國內地，更重要的是，澳門本身就成為東來的西洋文明承載之地和積澱之地。”<sup>①</sup>以這一全新視角而切入的中西關係研究，其所關注的重點就不再是中國和歐洲，而是這兩者相匯合之處——澳門。因此，《天朝異化之角》這部學術專著應該是目前澳門歷史研究中的一項重大突破性成果，不論從歷史的涵蓋規模與內容，還是公佈與利用的中西文獻檔案之繁富，以及學術研究質量之超邁，均堪稱澳門歷史研究領域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巨著，故此也應成為我們認識16—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文獻。

## 一、《天朝異化之角》所展現的宏大歷史述事

作為最早接受西洋文明的地方，澳門自16世紀到19世紀中期始終是整個“天朝”中國西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以葡萄牙人為首的大批西方人口的湧入，給澳門帶來了西方的政治文明、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這些西洋文明在澳門落地生根，逐步融入澳門社會。

《天朝異化之角》立足澳門，從澳門的視角看待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西洋文明在澳門呈現的種種情態。正如書名所傳遞的意義那般，鴉片戰爭之前的明清王朝不論是在最高統治者還是卑賤下民的心目中，均是一個“天朝上國”的形象，其體制承載着數千年儒家文化的傳統。然而，就在這一“天朝上國”最偏遠的一個角落，澳門正接受和浸潤着來自遙遠西方的文明。“天朝”指的是明清帝國，而澳門這塊承載西洋文明的“飛地”，則是一個令國人瞠目、外人稱羨的“異化之角”。“角”字點明了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異化”則表明了其在“天朝”的中國文化傳統土壤上開始接受並由小及大地逐漸擴散着西洋文明。

澳門西洋文明的研究是湯開建教授二十餘年來澳門學研究生涯中始終關注的一個課題。《天朝異化之角》則是在他以往的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加以整合並補充更多新鮮史料所進行的一次更為全面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冊，長達一千四百餘頁，共兩百萬字，可謂鉅制宏篇、篇次分明、體例貫一。該著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敘史體系，指涉時間為從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到19世紀中後期香港取代澳門的三百餘年，涉及的方面包括政治、法律、軍事、城市建設、

<sup>①</sup>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前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

宗教、科技、教育、醫療、文學、藝術、社會風俗等。這樣龐大而複雜的敘史體系，建構起來並不容易，湯教授表示：“由於本課題研究歷史時間長達350年，所涉內容包括十幾個領域，涉及面極為廣泛複雜，而且有很大部分內容屬原創新作，再加上徵引的各種檔案文獻，牽涉中西多國語言文字，無不增加了本研究的學術難度。”<sup>①</sup>

第一章為“闖入澳門的西洋人”，也是全書比重最大的一章。考慮到西洋文明的傳播首先要從“西洋人”的角度切入，因此，作者將所有進入澳門的西洋人列入全書的首篇，可謂匠心獨運。該章分兩節考察了19世紀前來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他非葡籍西洋人，展現出生活在澳門的歐美西洋人的整體圖景。第一節關注的是葡萄牙社群的人口數量和構成、開拓澳門的葡萄牙人先驅，以及逐漸在澳門形成和發展的土生葡人家族，同時分析了葡萄牙人社群和土生葡人家族不同時期發展的不同特點。作者認為，多元化的葡萄牙社群是澳門西洋社會的主體，澳門混合型葡人社群形成和發展於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而17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後期則是澳門葡人社會的衰落時期，這也是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及的。第二節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入居或者經停澳門的非葡籍西洋人。這一節作者所耗費的精力遠超他對葡萄牙人社群的研究，因為16—19世紀中葉進入澳門的非葡籍西洋人範圍太過廣泛，包括了歐美十幾個國家，如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丹麥、瑞典、奧地利、瑞士、波西米亞、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立陶宛、俄羅斯及美國。其中英國人最多，統計人數達到一千數百人；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美國居其次，均在數百人以上。作者從數百種文獻檔案中搜羅出這些居住在澳門的非葡籍西洋人名單，其目的就是要突出“人”，正因為如此大規模的非葡籍西洋人經停和入住澳門，才導致16—19世紀澳門既傳入了伊比利亞半島及亞平寧半島傳統的南歐天主教文明，同時又出現了剛剛興起和發展的西歐、北歐的基督新教文明，甚至工業革命以後英、美資本主義文明也展現在澳門這一小城之中。

第二章為“澳門的西方政治、法律與軍事”，該章分別介紹了澳門的西方城市制度、澳門總督制及澳督集權制的形成、西方司法與法律制度、西方軍事及警察制度。全面展示了西方政治、法律、軍事及警察制度移植到東方的過程。澳門參與並見證了地理大發現以來，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中的伊比利亞文明相互接觸與交流的過程。<sup>②</sup>中國人從西方人在澳門的行政管理經驗、地方自治經驗、法治傳統以及人的自由、權利、尊嚴等方面獲得了許多有益啓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所介紹的議事會的民主選舉制度、西方的警察制度及律師制度，都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出現的西方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在中國政治制度史及司法制度史研究中應具有特殊的借鑑意義。

第三章為“澳門城市建設中的西洋文明”，該章分五節分別介紹了澳門的直街與前地、城堡及炮台、堂區及教堂、西方公共建築、西洋式私家住宅花園。從文獻檔案及古圖像資料中真實地還原古代澳門城市建設中的西洋元素及其變遷。該章最為珍貴的地方是公佈了大量的澳門城市建築的各類圖像資料，通過截圖與文獻的相互印證，將16—19世紀澳門城市中出現的主要西洋建築進行了詳細地考證，不僅清楚地說明城市西洋建築的歷史演變，而且非常直觀地給讀者提供了

①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前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頁。

② 婁勝華、潘冠瑾、趙琳琳：《自治與他治：澳門的行政、司法與社團（1553—199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18頁。

每一類建築不同時期的形態，既敘述了城市歷史的發展，也提供了建築歷史的審美。

第四章為“澳門的西方宗教”，作者首先描述了天主教澳門主教區的建立過程及教區建立後天主教的發展與衰落，其次詳細介紹了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在澳門的天主教修會和教會機構，接着又介紹了仁慈聖母兄弟會、羅薩里奧聖母教友會等數十個澳門天主教社團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宗教活動，此外，特別對澳門歷史上天主教徒的禮拜和彌撒、八大瞻禮、主保神紀念及聖像巡遊的節慶活動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而這些內容多為以往的澳門史研究著作所漏載或缺載的。最後，還對天主教掌控下的澳門其他西方宗教如基督新教、瑣羅亞斯德教、伊斯蘭教等進行了全面介紹，以表現16—19世紀時期在“天主聖名之城”的澳門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多元西方宗教。

第五章為“澳門的西方科學技術”，該章探討了16—19世紀時期的天文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以及西方築城術、鑄炮術、造船術、鐘錶技術、望遠鏡、印刷術和科技書籍等西方科學技術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解答了在西學東漸過程中西方科學技術傳進澳門的數量問題。以往，這一類型的研究大多關注這些科學技術通過澳門這一橋樑對中國內地產生的影響，較少關注這些技術在澳門的傳播與沉澱。因此，這一章的大部分內容都為前人所未涉及。

第六章為“澳門的西方教育”，介紹了澳門西方教育的三大類：天主教教育、基督新教教育和公共教育。作者認為天主教教育是16—19世紀澳門教育的主體；基督新教教育在澳門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但在澳門教育史上仍產生了重大影響；公共教育起步晚，至18世紀70年代後才出現，但卻以多種辦學的形式逐漸替代澳門的教會教育，最終促進和推動了澳門近代教育制度和體系的形成。

第七章為“澳門的西式醫療與西方醫學”，介紹了澳門天主教背景下的西方慈善醫療、服務於世俗社會的公共醫療、基督新教醫學傳教與澳門醫療的近代化、“澳門的西方醫學、藥物及流行病”。第一節介紹了澳門的慈善醫療，從貧民醫院、麻風病院、耶穌會聖保祿學院的診所和藥房、聖方濟各會的診所和藥房、傳教士醫生五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二節介紹了澳門的公共醫療，從政府醫生的產生、制度化及制度的執行來表現公共醫療的不斷完善，對於政府醫生制度，以往學者關注不足，該著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論述；第三節介紹了澳門近代醫療體系的形成及初步發展；第四節從整體上介紹了澳門的西方醫學、外來藥物及流行病，特別是對外來藥物和流行病的研究，其內容填補了澳門醫療史的空白。

第八章為“西方語言、文學在澳門”，該章從語言和文學兩方面入手，介紹了16—19世紀澳門西洋語言及西洋文學的傳播與發展。第一節介紹了葡萄牙語、土生葡語、拉丁語、英語、洋涇浜英語以及其他西方語言在澳門的傳播；第二節為西洋文學在澳門，以時間為順序，從早期的《遠遊記》與《葡國魂》開始，介紹了傳教士們與歐美社群帶來的西方文學，以及18—19世紀在澳葡人的文學創作。以往澳門的西洋文學研究只有首尾而無中間，只知道早期的《遠遊記》、《葡國魂》，接下來的就是晚近以後的澳門土生葡人文學，較少研究17—19世紀歐洲天主教文學及近代西方文學在澳門傳播這一問題，該著從多方面搜集資料，填補了澳門文學研究史上的這一空白。

第九章為“澳門的西洋美術、音樂、戲劇及體育”，該章分四節分別介紹了傳入澳門的西洋美術、音樂、歌舞戲劇和體育。第一節以時間順序分述16—19世紀西洋美術傳入澳門以及中國內地的各個階段；第二節介紹了天主教音樂、西洋音樂以及世俗西洋樂的發展及傳播；第三節論

述了早期葡萄牙人、英國人以及土生葡人的歌舞戲劇；第四節記述了葡萄牙人帶來的騎士體育、東印度公司的紳士體育以及這些西洋體育傳入後在學校的傳播。此章主要是來自作者以往的論文成果，但明顯增添了不少翻譯自葡、法、英、日等國的新材料和新內容。

第十章為“澳門西洋社會生活及風俗”，從婚姻禮俗、喪葬風俗、服飾穿戴、飲食行住及交際禮儀等方面展開。婚姻禮俗一節介紹澳門葡人的婚姻制度、觀念、形式、形態以及英美基督新教徒的婚姻及禮俗；喪葬風俗一節介紹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兩者的喪葬習俗及墓園；服飾穿戴一節分別介紹了葡萄牙男人和女人的服式、髮飾和配飾，還特別介紹了16—19世紀葡萄牙女子服飾發展的特點，尤其是後期英美婦女服飾對澳門葡人服飾的影響；飲食一節則從澳門葡人的飲品、食品、西餐與宴會四個角度進行介紹，當中有對很多飲品和食品傳入澳門的考證，尤具學術難度；行住及交際禮俗一節介紹了澳門葡人的出行、居住以及交際禮儀三個方面。這一章的絕大部分皆為以往學者未有研究的新內容，表現形式特別細膩。

《天朝異化之角》一書通過以上十個章節，章章相連，環環相扣，以西洋文明這一條紅線，將16—19世紀時期澳門的政治、司法、軍事、城市建設、宗教、科學技術、教育、醫療衛生、語言文學、藝術、體育及社會習俗緊緊地連貫起來，以一種宏大歷史敘事的觀念、全方位圖景式的視野，系統地闡述了該時期傳入澳門的西洋文明風貌，反映了西洋文明傳入澳門後深深扎根於澳門這塊小小土地之上的歷史史實。

## 二、《天朝異化之角》極具個人學術風格

湯開建教授治學四十餘年，其學術風格嚴謹、崇尚考據，喜以排山倒海的方式徵引史料，寧繁毋簡羅列證據，且中西並舉相互比勘，所引史料力求原典，不論是在西夏學、西北輿地學，還是澳門香港學、中西交往史及中國天主教史的領域中，這一風格始終未有半點改變。而《天朝異化之角》更是一部充分體現他這一獨特個人風格的學術著作，其討論如下：

### （一）窮源畢流，竭澤而漁

史料是歷史學研究的根基，無徵不信是史家所恪守的準則。陳垣給學生上課時常講的一句話就是“竭澤而漁”，意即史學作者就一個問題搜集材料時，盡量不要有所遺漏。<sup>①</sup>在治史的過程中，湯開建教授始終注重對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其治學的最大特點是崇尚實證，力求完備無遺地搜集史料，在此基礎上，盡量使用第一手資料，這正是“窮源畢流，竭澤而漁”的清儒家法。<sup>②</sup>

“窮源畢流”自古以來便為文人所道，如顧炎武就非常反對主觀臆斷，主張以客觀的方法關注學術研究的材料基礎，尤其重視對一手材料的利用。《天朝異化之角》使用的絕大部分為一手史料，例如，第一章關於明清時期澳門葡人人口發展與興衰的描述，幾乎囊括了全部葡文文獻、英文文獻及中文文獻中有關澳門人口的記錄，並利用當時的第一手資料對各個時期的人口發展和興衰進行比較、考訂，從而得到十分清晰的明清時期澳門葡人人口數據；第二章論及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總督制時，全文徵引了大量的澳門政府歷史檔案館出版的第一手葡文檔案 *Arquivos de Macau*（《澳門檔案》）；“澳門王室大法官”的部分引用了十多種第一手葡文檔案文獻；第四章

① 王學典：《20世紀史學進程中的“乾嘉範式”》，《新史學與新漢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4頁。

② 王學典：《20世紀史學進程中的“乾嘉範式”》，《新史學與新漢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3頁。

澳門天主教社團及其宗教活動部分，則全部採用葡萄牙學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所編纂的大型澳門天主教檔案史料集*Macau e a Sua Diocese*(《澳門及其教區》)及白樂嘉(Jack M. Braga)編纂的檔案集*A Voz do Passado: Redescoberta de a Coleção de Vario Factos Acontecidos Nesta Mui Nobre Cidade de Macao*(《往昔的聲音：近年來在這座光輝的城市——澳門所發生的真實事件系列藏書》)，利用第一手葡文檔案，系統研究澳門的天主教社團及其宗教活動；第六章關於聖保祿學院研究的部分，全面利用了葡萄牙學者奧利維拉·柯斯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編輯的*Cartas Á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 – 1627)*(《聖保祿學院年報 1594 – 1627》)，並輔以日本學者高瀨泓一郎的《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天主教時代的文化與各種現象》)中所提供的日語資料，其中對葡文原始檔案史料的使用率更是高達60%以上，而這尚不包括已經被他人翻譯出版的部分；再如在第八章西洋文學傳入澳門這一節中，作者通過對美國姑娘哈麗特·洛(Harriett Low)日記中所記錄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整理，查出哈麗特·洛在澳門的四年多的時間內閱讀了歐美小說65種、回憶錄12種、歷史著作15種、遊記著作9種、傳記5種、日記1種，涉及的作家國籍包括英國、法國、西班牙、美國，其中被稱為“歷史小說鼻祖”的著名英國小說家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作品在澳門反覆出現，從而得出19世紀歐美西洋文學在澳門傳播的大量史實，此認知足以顛覆以往學術界的結論。

《天朝異化之角》是一部以大量翔實史料為根基構建起來的學術巨著，書中所表述的所有史實皆有據可查，而第一章的表格最能體現作者“竭澤而漁”的治史理念。這些表格需要參考大量書籍，由各國人員名錄、人口數量變化、抵澳船隻數量等諸多要素構成，其內容龐大，敘述精確，其中尤以對16—19世紀來澳和居澳西洋人的系統性統計，為史學界首次之舉。舉例來說，書中的《16—19世紀居住於澳門的英國(含愛爾蘭)商人名錄》共計43頁，參考中、葡、英、美、法等五個國家的書籍數量多達四十餘種，可見其內涵的豐富和複雜。

## (二) 考據精確，中西並舉

清人戴震倡導的“每識一字，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sup>①</sup>郭沫若稱：“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sup>②</sup>除了前賢們對考據重要性的肯定外，如今史學界也更是與時俱進地提出了“e考據”，可見在歷史研究中，對考據的重視是貫穿始終的。湯教授不僅一貫注重考據，他還提出了在中西交流史中“兩條腿走路”的治學理念，他說：“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必不可少，一條腿必須站在堅實的中文檔案的基礎之上，另一條腿則必須邁進浩瀚無涯的各種西語檔案文獻的海洋之中，缺一不可。”<sup>③</sup>這種中外史料互證互補的原則正是將歷史學研究推進到嚴謹科學研究的最為必要的手段。因為同樣的歷史事實，不同的社會階層、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價值取向的人，特別是採用不同語言記錄的人，往往會留下大相逕庭乃至截然相反的記錄。

尊崇考據是湯教授治學的一貫特點，系統梳理和精確考證則是《天朝異化之角》一書的特色。書中利用一些中文文獻對澳門歷史進行考證勘比，且某些史料也是作者最先使用於歷史敘述中的。澳門歷史背景複雜、記錄多樣，不僅散佈各經史子集當中，還有用多種語言書寫的外文史

① 孫培清：《中國教育思想史》第2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34頁。

②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88頁。

③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序”，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頁。

料。正因為文字資料歧義甚大，文獻之間又有抵牾和矛盾，故不同史料之間的相互印證便十分必要。如何系統完整地搜集和利用中西文獻有關澳門的史料並互相印證，是該著完成的第一前提。

澳門史研究的史料分爲中、西兩大部分，明清中文文獻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文文獻中關於澳門的記錄不僅時間跨度長，且範圍極廣，遍佈於傳統文獻的經史子集諸部，各種史料的匯集、考證與索隱，本身就是對澳門歷史研究的挑戰與擴張。這些史料是中國學者在進行澳門史研究中最常使用到的，對於澳門史研究的中國學者而言，中文史料的優點首先在於語言的共同性。然而，除了大量的中文文獻外，澳門史研究領域的倉儲中還“沉睡”着難以數計的外文史料，如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日文等，但大部分學者都未真正大規模地發掘和利用這些第一手西方語言文獻檔案，而《天朝異化之角》在這方面下了苦功，始終注意中西史料同時並舉互證，在史實的求證過程中盡量平衡歷史的客觀性。

該著運用中文史料和葡文史料相互勘比，徵引澳門外文主體檔案，通過引用西方其他國家的商人、旅行家、傳教士等留下的各種語言文字的傳記、遊記、日記、回憶錄等進行補正，甚至以多種中西史料來論證同一歷史事實，如在第一章關於澳門葡萄牙家庭人口及澳門葡人社群中的“葡化華人”問題上，先訪尋明高汝栻《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及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關於華人“漸化爲夷”的論述，再引述葡萄牙學者萊薩（Lessa Almerindo）《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印度學者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及美國學者衛思韓（John E. 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使團與幻想：康熙時期荷蘭與葡萄牙的貢使（1666－1687）》）所徵引的外文檔案進行補正。在第二章議事會創建的時間及創建者的問題上，由於創建議事會的原始檔案並無存留，無明確的關於議事會創建的時間及創建者的記錄，故出現了1583年、1584年及1585年三種說法，該著利用《1592年1月基爾·馬塔請求國王陛下賜予澳門城權力及組建政府》檔案、1623年澳門議事會書記官迪奧戈·雷戈（Diogo Caldeira Rego）在《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德禮賢（Pasquale d'Elia）《利瑪竇全集》、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博克塞（C. R. Boxer）《熱帶葡萄牙社會》及潘日明徵引《市政廳古文獻》1862年澳門市政廳主席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基瑪良士致澳門總督基瑪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的書信進行詳細考證，最後得出明確的結論，即澳門議事會建立的時間爲1583年4月，並證明了薩主教（D. Leonardo de Sá）爲澳門議事會的創立者而非賈尼勞（D. Belchior Carniero Leitão）。同章在關於仁慈堂內興建育嬰堂和孤兒院的問題上，既徵引《澳門記略》、《澳門記》、《澳門竹枝詞》、《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及《澳門憲報》中的中文資料，同時又徵引Luís Gonzaga Gomes（高美士）的 *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C. R. Boxer（博克塞）的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施莉蘿的《社會救濟活動及權力機制：仁慈堂之起源》、John E. Wills（衛思韓）的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的葡文檔案予以佐證，而將仁慈堂的育嬰堂和孤兒院從創建到興衰的過程基本考證清楚。第三章關於澳門直街及澳門城牆修建始末問題，該著在梳理十餘種中文文獻的基礎上，再輔以數種17世紀葡文檔案以及歐洲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原本十分模糊的直街問題及澳門修城問題考證的十分

清楚，即“從龍嵩正街到營地大街也就構成了直街的最核心部分，成為古代澳門的主街”。<sup>①</sup>第五章關於各類西方科學技術在澳門的傳播及外來動植物的引入的考證，更是中西史料相互比勘的典型，每一類科學技術的傳入既採中文史料記錄，又用西方史料比證，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 三、《天朝異化之角》中的新問題、新結論和新史料

史學研究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地挖掘新材料和發現新問題，展開新研究，得出新認識。《天朝異化之角》一改大多數通史型著作中只敘述而無考證的寫作方式，在煌煌兩百萬文字中，不僅平實地敘述了從16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的出現到17—19世紀之間的發展以及隨後的衰落這三百餘年的歷史史實，且在敘述史實的同時夾辯證考據於其中，使敘述、論證、考據三者錯陳相雜，融為一體。該著在龐大的敘史體系的園圃中，綻開出萬紫千紅的創新花蕾，填補空白，訂訛糾謬，推陳出新。揭櫫書卷，創新之處，不勝枚舉。

#### （一）新問題

以往治澳門史者中涉及澳門西方文化的研究並不少，而領域多集中在其西方政治、宗教、建築、教育、醫療、語言、音樂、美術、體育等諸多方面。然而，其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未被人開墾的處女地。即使是上述已經為人涉獵的西洋文明諸方面，仍有一些問題和研究或語焉不詳，或一筆帶過，或無據出論，以致仍為“空白”。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中西史料龐雜，難以融合匯聚，而研討上述問題，最需解決的卻是葡文檔案的翻譯與解讀問題。誠如前言，作者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充足的準備才開始進行研究，他以十餘年的時間積累澳門中文檔案文獻資料，然後又組織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西方檔案文獻翻譯學術隊伍，在此基礎上，他的研究大膽地提出了一些前人未曾開發或容易被忽略的新問題，填補了澳門歷史研究中一個又一個的空白。因此，該著涉及澳門史研究各領域中的很多空白問題，其中包括：警察制度、軍事防禦制度、律師制度、市政建設、16—19世紀天主教社團及其宗教活動、16—19世紀的流行病、18—19世紀西方文學在澳門的傳播、澳門天主教的婚喪習俗、澳門葡萄牙人的衣食住行習俗等等。一些如澳門西方政治中的總督制度、司法制度、軍事制度等，曾被一些學者所關注，但從沒有人對王室大法官制度、議事會中的普通法官及孤兒法官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進行過認真的考證和系統的論述，而這幾項司法制度是澳門司法發展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問題，在現存的大型澳門通史著作中，這些問題都是一筆帶過，以致學術界對這幾項澳門最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基本上沒有瞭解，甚至帶來完全相反的錯誤認識。而該著則以三、四萬字的篇幅，利用數十種中西文獻檔案，將這一些問題進行了條分縷析地考述。

其次，在澳門城市建設發展中對“澳門直街”的考證與研究，不能不說是這一領域提出的新問題。該著將中文文獻中記錄的“畏威懷德”四街考證為東西向的大街，亦即為澳門直街。這一新穎觀點的提出不僅令人訝其大膽，且認真考索和比證中葡檔案文獻，才能意會到這一新結論的在理。又如其對澳門城市建設中“澳門堂區”形成與發展的關注，也是以往研究中未有人涉及的，作者搜集大量的中葡檔案文獻，對澳門堂區的起源、形成進行了細緻的考證，通過1576年8月18日耶穌會士克里斯托旺·達·科斯塔（Cristóvão da Costa）神父的信件，發現在1576

<sup>①</sup>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71頁。



年，澳門大堂、聖老楞佐堂和花王堂三個堂區已經設立，1633年增加望德堂區，後因城內基督徒的減少，17世紀後期又被裁撤，因此18世紀後期在澳門只見到三個堂區的記錄。除此以外，作者還對“堂區”作出定義，他認為澳門的“堂區”除了是天主教的“堂區”外，亦是澳門的“行政區”，因為澳門的堂區是教會聖統制下的堂區，行政劃分與教會劃分一致，這也正是葡萄牙國家行政劃分的特色。

第五章澳門的西方科學技術、第六章澳門的西方教育、第七章澳門的西方醫療及第十章澳門的西洋風俗等章節中，作者提出了很多以往學術界不曾有人問津的問題。如澳門的西方造船業，作者根據明羅大紘《紫原文集》，日近藤守重《亞媽港紀略稿》、平托《遠遊記》、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以及英人《芒迪遊記》等文獻，提出了澳門開埠以後就形成了自己的造船工業，即所謂的“亞媽港船”，但由於明清政府對於澳門造船工業的扼制，致使其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入清以後，澳門葡萄牙人又在對面山、灣仔等地建造船塢，修造船隻，但仍受清政府的嚴格管治。直到嘉道以後，由於歐美商人在澳門住冬，故在澳門開辦多家造船廠，生產“巴爾的摩”式縱帆船，將歐美的先進造船技術傳進澳門。鴉片戰爭後，由於澳門護航業的發展，加上清政府無法再控制澳門，致使澳門內港的造船業走向巔峰。作者將這一問題進行了完整細緻的考述，無疑增添了澳門西方科學技術發展史的分量。又如作者在澳門專門教育部分對澳門航海學校的起源、發展及興衰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從創辦於18世紀80年代的澳門航海學校、後來的皇家航海學校、一直到20世紀初的澳門新航海學校，其歷史詳情一直鮮為人知。作者利用文德泉神父整理出來的澳門教育史檔案，清楚地論述了這一學校發展的各個階段，為澳門的西方教育增添了許多新的認識。又如在澳門的公共醫療方面提出的“政府醫生”和其政策的制度化問題，也是澳門史研究中提出的新問題。作者依據 *Arquivos de Macau*（《澳門檔案》）、文德泉神父和蘇亞雷斯（José Caetano Soares）醫生整理出來的葡文資料，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極為細緻的考證和研究。再如荷蘭薯、咖啡樹、西紅柿、巧克力等物種的引進，也是前人著作未曾解決的問題。

## （二）新結論

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頭堡，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擁有的中外史料多而紛雜。多即數量浩如烟海，令人難以搜尋；紛雜即十餘種中外語言文字的記錄雜錯相陳，使同一記錄歧見迭出，令人難以準確把控。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訛誤。而對已有的史料和結論進行新的分析、整理和辨別即該著中最有價值的地方之一。例如，第三章關於議事亭建築風格的考證，很多學者都認定早期的議事會是一座明朝官方所建的中國式庭園建築，但作者翻閱《澳門記略》、1590年代“亞馬港全圖”記錄的議事會、1632年“澳門要塞圖”等資料，發現早期澳門議事亭的建築並非中國式的庭園建築，而是一座完全西洋風格的西式建築。《澳門記略·議事亭圖》將澳門議事亭繪成爲一座飛檐畫棟的中國庭園式建築，應是沒有見過議事亭原型的中國畫工的誤作。這一新結論不僅具有眾多的中西文獻作憑據，且也與歷史的事實與邏輯統一。

在第四章中，作者否定和批判了學術界流行的耶穌會在澳門設立“宗教裁判所”的說法。他認為不能因爲果阿宗教裁判所有權對澳門所有的異端行爲進行調查和處罰，進而得出澳門有宗教裁判所的結論。在歐洲，長期以來都是由多明我會組建宗教裁判所，耶穌會無權在澳門組建宗教裁判所。葡萄牙本土和果阿均設有宗教裁判所，但從澳門城初建到葡國於1821年廢除宗教裁判所制度，裁判所都未在澳門土地上設立法庭。而關於在澳門的宗教裁判員，他們只是果阿宗教裁

判所派遣到澳門工作的官員，並非都享有很高的權威。作者通過對大量葡文史料的梳理，列舉了多個歷史事例，證明了耶穌會在澳門設立宗教裁判所這一結論的謬誤。

在第五章望遠鏡在澳門的傳播一節，作者大膽地提出利瑪竇有可能將望遠鏡帶入中國這一假設，他認為不能僅以伽利略創製的天文望遠鏡的時間來否定利瑪竇帶千里鏡入華的中文記載，因為在伽利略創製天文望遠鏡之前，歐洲其他國家已經先後成功地發明了多種望遠鏡，而在利瑪竇之前也有使用望遠鏡的記錄。此外，在利瑪竇逝世前後，中西文獻均已明確記錄望遠鏡已經傳入中國。作者通過全面系統地搜集中西史料，發現了眾多望遠鏡從澳門傳入中國的記錄，由此得出望遠鏡的傳播應是葡萄牙人將其帶到澳門，並由傳教士等將其傳入中國內地及周邊地區。

第八章關於莎士比亞傳入中國的時間，歐洲文學史家認為“莎士比亞的名字最初是隨着《四洲志》的問世被偶然引入中國的”，也就是說莎士比亞是在1839年林則徐組織人翻譯《四洲志》時候傳入。但作者發現，澳門東印度公司圖書館1819年的書目中已經存有《莎士比亞戲劇集》，1829年澳門的英美社群還進行了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的演出。而翻譯《四洲志》的梁進德也曾經在澳門居住，他在編譯《四洲志》之前很有可能就在澳門聽說過莎士比亞，而並非學界認識的那樣是在《四洲志》時期才第一次提到莎士比亞。

在第九章西洋體育傳播一節，一般論著均將澳門賽馬活動始於1842年香港的英國人借澳門馬場舉行的賽馬，但未進行過過深入的考證，作者在翻閱史籍的過程中發現賽馬的傳入遠早於1842年，乾隆時葉廷勛、葉廷樞兄弟的詩集就已記錄了澳門的賽馬。之後1828年的葡文資料、1834、1835、1836年的英文資料都非常清楚地記錄了在澳門關閘附近的黑沙環建有賽馬場，並多次舉行賽馬。據這些中西文獻史料所載，可知澳門關閘的賽馬活動早在1789年之前已經開展，這比以往澳門賽馬活動始於1842年香港的英國人這一結論推前半個多世紀。

### （三）新史料

在《天朝異化之角》之中，作者將其二十餘年治澳門史所發掘、整理，以及組織隊伍翻譯的、為量甚巨的各種新史料都運用其中，當中有些是近年來新發現的、前人未在澳門史研究中使用過的中文史料，如劉承範《利瑪傳》、沈淮《南宮署牘》（日本內閣文庫本）、畢方濟《坤輿全圖》、湯若望《坤輿格致》、羅大紘《紫原文集》、徐時進《鳩茲記》、何喬遠《鏡山全集》（日本內閣文庫本）、韓霖《委黎多〈報效始末疏〉》、趙嘏《植品》、秦元方《熹廟拾遺雜咏》、劉世馨《粵屑》、范景文《戰守全書》、鄭文郁《經國雄略》、茅元儀《督師記略》、余應虹《鑄古今兵家籌略》、查慎行《人海記》、王廷鈐《（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探訪冊》、揭暄《璇璣遺述》、佚名《拜客訓示》、佚名《敬一堂志》、馬光啓《嶺南隨筆》、林則徐《紅毛番書》、佚名《澳門番語雜字全本》、佚名《紅毛買賣通用鬼話》、佚名《紅毛番話貿易須知》、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盛鴻燾《南溪盛氏家譜》及吳旻、韓琦《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匯編》、安雙成《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等。這些中文史料都是作者在1999年《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文獻卷）》出版以後新發現的澳門歷史資料。

然而，該著翻譯和利用最多的新西文史料當屬葡語檔案文獻。我們知道，在中國學者的澳門歷史研究中，難度最大的就是葡語資料的利用與翻譯，可以說，葡語資料的利用已經成為中國學者研究澳門歷史時最為艱難的“瓶頸”。作者雖然沒有專門學習過葡語，但當澳門歷史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層次以後，他深深地意識到，如果再不對現存的規模巨大的葡語檔案文獻進行整理與翻譯的話，將不能深入地進行澳門歷史的研究工作。因此，不管是在澳門還是中國內地，他總是奔

走呼籲，希望澳門學界能展開一場16－19世紀葡萄牙語檔案文獻翻譯運動。在其能力範圍之內，他已經組織了數十名精習葡文的博士、碩士對相關的澳門歷史檔案文獻進行翻譯。《天朝異化之角》最可貴的就是大規模地利用了他所組織的團隊，翻譯了許多第一手的葡文檔案和文獻，例如 *Arquivos de Macau, 1<sup>a</sup>-3<sup>a</sup> Série*（《澳門檔案》第1到第3系列）、Artur Teodoro de Matos, *Documentos Rem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1625 – 1736)*（《季風書1625 – 1736》）、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Cartas Anuai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 – 1627)*（《1594 – 1627年聖保祿學院年報》）、Elsa Penvalva, Miguel Rodrigues Lourenço, *Fonte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no Século XVII*（《17世紀澳門史料》）、Jack M. Braga, *A Voz do Passado: Redescoberta de a Coleção de Vario Factos Acontecidos Nesta Mui Nobre Cidade de Macao*（《往昔的聲音：近年來在這座光輝的城市——澳門所發生的真實事件系列藏書》）、Antó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遠方亞洲》）、Elsa Penalva, Miguel Rodrigues Lourenço, *Fonte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no Séc. XVII*（《澳門17世紀歷史的原始資料集》）、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A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中國年信》）、José de Jesus Maria, *Ásia Sínica e Japónica*（《中國和日本的亞洲》）、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澳門的葡萄牙人1750 – 1800》）、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澳門的保安部隊》）、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澳門與福利——社會、醫療統觀》）、Ana Maria Amaro, *Introdução da Medicina Ocidental em Macau e as Receitas de Segredo da Botica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澳門西方醫學與聖保羅學院藥房秘方導論》）、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I – Vol. III*（《澳門土生葡人家族》第1 – 3卷）、C. R. Boxer, *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復國時期的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澳門及其教區》）、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16世紀的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17世紀的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18世紀的澳門》）、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澳門的起源》）、Manuel Teixeira, *Leal Senado*（《澳門的議事會》）、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Vol. I – Vol. II*（《澳門的軍人》第1 – 2卷）、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澳門的教育》）、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I – Vol. II*（《澳門的地名》第1 – 2卷）等等。除此以外，書中還有相當數量的史料來源於當時的葡文報刊，如 *A Abelha da China*（《中國之蜂》）、J. 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Archivos e Annaes do Extremo-Oriente Português (1863 – 1866, 1889 – 1900)*（《大西洋國1863 – 1866、1889 – 1900》）、*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澳門教區通訊》）、*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澳門和帝汶省政府憲報》）、*O Macaense*（《澳門土生報》）等等。以上所列僅僅為部分書中所徵引之葡文文獻，從徵引外文文獻的層面上來說，《天朝異化之角》一書應是中國學術界真正走進國際澳門學研究前沿的代表性著作。

此外，與葡語檔案文獻相比，本著的英語報刊文獻及研究著作的利用也毫不遜色。粗略計之，反覆徵引的重要英語文獻不下數十種，如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550 – 1575):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oale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 P., Fr. Martin de Rada, O. E. S. A*（《16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伯來拉、加斯帕·達·克路士神父、馬力陳神父

的記載 1550 – 1570》)、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 1550 – 1770》)、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 (《葡萄牙海洋帝國 1415 – 1825》)、C. R. Boxer, *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 – 1800* (《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1510 – 1800 年果阿、澳門、巴伊亞、羅安達的議事會》)、C. R. 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17 世紀的澳門文獻與圖畫》)、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 1415 – 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 (《聖母瑪利亞和厭女症：伊比利亞海外貿易的擴展中的女性：史實、逸聞與個案》)、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 – 1724* (《東遊記：1579 – 1724 年來華的耶穌會士》)、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 – 1667* (《彼得·芒迪歐亞遊記，1608 – 1667》)、Emma Helen-Robertso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菲島史料 1493 – 1898》)、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 – 1834》)、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陶瓷與中荷貿易》)、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 – 1687* (《使團與幻想：康熙時期葡萄牙與荷蘭使團 (1666 – 1687)》)、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供職於中華帝國的馬國賢神父在北京宮廷居住十三年的回憶錄》)、Luís Filipe Barreto (ed.), *Tomás Pereira, S. J. 1646 – 1708: Life, Work and World* (《耶穌會士徐日升生平、工作及他的世界》)、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 – 1845* (《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1700 – 1845》)、Paul van Dyke, *The Canton-Macao Dagregisters, 1762 – 1764* (《廣東澳門日志 1762 – 1764》)、Harriett Low Hillard & Arthur W. Hummel (au.), Nan P. Hodges (ed.),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澳門生活的光與影：旅行姑娘哈麗雅特·洛的日志》)、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Lindsay Ride, May Ride, Bernard Mellor,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東印度公司墳場：澳門新教徒墳墓》) 等等。上面提到的 5 種博克塞澳門史研究著作，基本上都是用 16 – 18 世紀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及拉丁文檔案文獻編纂的史料集，其中很多檔案史料至今不存。而《菲島史料》、《陶瓷與中荷貿易》和《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 – 1834》則是用英語翻譯的西班牙、荷蘭與英國對華交往與貿易的檔案史料集，這裏面所保存的西班牙文、荷蘭文和英文檔案資料極為珍貴。而《東遊記：1579 – 1724 年來華的耶穌會士》一書主要是利用了葡萄牙阿茹達圖書館所藏的 *Jesuitas na Ásia* (《耶穌會士在亞洲》) 和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的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日本和中國檔案集》)，而這兩套檔案都是手稿，因此，徵引《東遊記》一書仍然可以為我們解決很多中國學者對澳門史研究的艱難之處。此外，幾部新近翻譯的英語著作也為此著提供了許多極為珍貴的澳門新史料，如[美]范發迪著、袁劍譯的《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美]雅克·當斯著；周湘、江滢河譯的《黃金圈住地——廣州的美國商人群體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1784－1844》(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1844)、[英]喬治·馬戛爾尼、[英]約翰·巴羅著；何高濟、何毓寧譯的《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An Embassy to China Travels in China)、[英]亨利·埃利斯著；劉天路、劉甜甜譯的《阿美士德使團出使中日誌》(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美]衛斐列著；顧鈞、江莉譯的《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美]愛德華·V·吉利克著；董少新譯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英]詹姆斯·奧朗奇編著；何高濟譯的《中國通商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The Charter Collection: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kong, Macao, 1665－1860)、[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著；《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的《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等等。還有書中對19世紀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英文報刊也有大規模地引錄，如The Canton Register(《廣州記錄報》)、The Friend of China(《中國之友》)、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The Canton Press(《廣州周報》)、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1869(《美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報告1849－1869》)，這些內容極為豐富的英語報刊資料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澳門社會歷史。

除葡、英兩語以外，還有其他語種的檔案文獻，西班牙文檔案文獻有Sinica Franciscana, Vol. VII－XI(《中國方濟各會傳教志第7－11卷》)、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1632－1700)，(《多明我會中國傳教志1632－1700》)；法文檔案文獻有Louis Dermigny,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查爾斯·噴士噠中國貿易回憶錄》)、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érouse,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拉布魯斯世界環遊旅行記》)、Etienne Marchand, Voyage Autour du Monde Pendant les Années 1790, 1791, 1792, Tome III(《1790、1791、1792三年的世界旅行》)、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巴黎外方傳教會，中國四川傳教史》)；日文新翻譯的資料則有近藤守重的《亞媽港紀略稿》，它是一部用日文記錄的澳門歷史文獻，其價值可媲美清中期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作者徵引《亞媽港紀略稿》中從日本人的角度觀察澳門所獲得的新史料，並首次運用到澳門歷史研究中來。

## 結語

澳門歷史研究雖已走過百餘年的歷程，但作為一門“澳門學”的專門學科，卻還是一門剛剛起步的新學科。20世紀末，隨着澳門回歸祖國，其歷史研究雖然進入了十分熱鬧的高潮期，但由於這一時期的研究論著質量參差，且政治意義遠大於學術意義，受到很多學者的批評。進入21世紀，澳門歷史研究回歸平靜，其內容卻引向縱深，且被納入到“澳門學”這一學科發展建設中來。中國學者一部又一部精深專到的學術著作開始出現，促使了澳門學的蓬勃發展。然而，其研究很快地就進入了“瓶頸期”，湯教授對此表示：

總結以往澳門歷史研究的經驗，如果還是那樣不痛不癢的寫幾篇文章，“海納百

川”地拼幾本大雜燴式的著作和論文，已經非常不利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以余所知，已經公佈的中西文獻檔案，絕大部分已被人們闡釋解讀，凸現的重要問題在已浮現的資料面上大多清晰。如再不啓動大規模的西語文獻翻譯工作，還是零零星星地翻幾則檔案，譯幾段史實，我們永遠也只能停留在歷史的碎化和真相的表層。沒有16—20世紀西語文獻檔案中澳門資料的徹底清底，一切談“澳門歷史”的研究者只能是片面的、膚淺的，甚至可以說是危險的。非如此，澳門歷史研究無法繼續深入往下走。鑑於此，余以為，西語文獻檔案翻譯資料的短缺，實際上已經成為澳門歷史研究進退維谷的“瓶頸”。我不想危言聳聽，但我希望我的話能引起不管是理論派還是史料派的重視。<sup>①</sup>

澳門歷史研究中出現的困頓與異化，其根源在於材料的單一與斷裂，欠缺第一手資料的支撐，形成了眾多澳門歷史時期的斷層，即使是研究“香火”十分鼎盛的早期澳門史，其空白和缺略仍然不少，甚至留下了許多永遠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要走出這一“瓶頸”，必須對16—19世紀中西文檔案文獻展開系統而全面的搜集、整理與翻譯，必須將西語檔案文獻整理與翻譯落實到操作層面，而《天朝異化之角》在一定程度上則是對16—19世紀西文檔案文獻整理與翻譯的落實，這一點，對於推進澳門學學科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以往學者對於澳門西洋文明之研究，由於原始文獻徵引的缺失和基本史實的疏漏，以致出現大量的根本性錯誤。該著大規模而深入地發掘和利用第一手中西語言檔案文獻，一定程度地對過往的錯誤之處進行了訂誤與完善。

澳門地方雖小，但16—19世紀澳門歷史發展的內涵卻覆蓋甚廣，從政治、宗教、城市建設到社會風俗，可以說無所不包。因此，從這一角度而言，澳門歷史研究亦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不可否認，各學科的交流互通一直是促進學術進步的重要途徑，尤其在當今多元並包的文化氛圍之下更是如此。《天朝異化之角》正是澳門歷史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型範例，從其展現出的澳門歷史上西洋文明的多學科知識體系而言，它就是一部16—19世紀的澳門西洋文明史，而分拆開來，則又是澳門西方政治史、西方法制史、西方軍事史、西洋城市發展史、西方宗教史、西方教育史、西方醫療史、西方語言發展史、西洋文學史、西洋美術史、西洋音樂史、西洋體育史及西洋社會風俗史。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

<sup>①</sup> 湯開建，《走出瓶頸：澳門歷史研究現狀與前瞻》，《澳門理工學院》（澳門）2013年第2期，第27頁。